

黨史資料

一九五三年
第一期

內部參考
不得外傳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黨 史 資 料

一九五三年
第一期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六月一日出版·

中央宣傳部關於「黨史資料」

擴大發行應注意事項的通知

一九五三年五月

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所編之「黨史資料」自今年起改為月刊，並經中央批准擴大發行範圍至地委正副部長以上黨員幹部（部隊、政府、企業、羣衆團體中相當於地委正副部長以上的黨員幹部與此相同）。

現將應行注意事項通知如下：

(一) 「黨史資料」改為月刊並擴大發行範圍的目的之一，在於吸引更多的熟悉我黨我軍歷史的同志提供有關的資料。為使這一工作不致停頓，均盼經常注意搜集資料，組織稿件，重視此項保存和積累黨史資料的工作。凡各機關及私人所藏黨史資料或著作、學校黨史教材、人民解放軍各部所編寫的戰史和各地老幹部所寫的有關黨史軍史的材料，均望隨時檢寄中央宣傳部。

(二) 「黨史資料」發給各同志，僅供各同志研究黨史的參考。其中事實和觀點不一定完全正確，因此，該刊所載稿件一般只准用作研究黨史的參考材料，特別註明者可作講授黨史的參考材料，故一律不得在黨外書刊上轉載，黨內其他書刊也不要轉載，如需轉載須經中央宣傳部批准。

(三) 「黨史資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新華書店按上述範圍發行，但不公開出售。該刊仍為黨內刊物，務希妥為保存，不得外傳或遺失。

以上三項望注意傳達並監督其實行為要。

附去「黨史資料」徵稿簡則和發行辦法，供參考。

「黨史資料」徵稿簡則

(一) 本刊出版的目的是爲着保存和積累黨史資料，便於黨內幹部研究黨史的參考。

(二) 本刊包括下列內容：

- 甲、有關黨在各時期、各地區革命鬥爭的原始資料、身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
- 乙、黨校教材和研究工作者的著述；
- 丙、傳記；
- 丁、有關黨史研究工作的通信。

以上取材範圍均以有關全黨或一個地區的全局者爲限。

(三) 希望一切熟悉我黨我軍歷史的同志爲本刊踴躍投稿。來稿經採用者均酌致稿酬。

「黨史資料」發行辦法

(一) 本刊讀者限於地委正副部長以上黨員幹部。得到本刊的同志或單位須負責保存，不得外傳。

(二) 本刊每月出版一期。每期定價七千元。一九五三年第一期至第七期（六月至十二月）一次預訂，訂費共計四萬九千元，無折扣優待。

(三) 本刊由新華書店發行，一律預訂。其預訂手續，由省（市）委或相當於省（市）委以上的黨委或黨組機關統計需要份數，統一向北京王府井大街新華書店北京分店內部發行組辦理（其

他各地新華書店不辦理預訂）。出版以後，由新華書店北京分店內部發行組直接寄發（寄交各黨委或黨組統一分發，或分寄各收閱人，可於預訂時通知新華書店）。

(四) 本刊一九五三年第一期至第七期預訂日期自五月十五日起至六月底止，逾期不收（外地預訂憑郵戳日期）。預訂以後概不退訂或增減份數。

(五) 本刊一律由郵局掛號寄遞。航寄每冊需另繳郵費。

目 錄

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上）	李銳一
武昌利羣書社始末	廖煥星 吉
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	廖煥星 夫
一個共產黨人——瞿秋白	楊之華 全
鄂豫皖根據地的革命鬥爭	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據地 訪問團鄂豫皖分團資料組 三
川陝邊革命根據地史略	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據地 訪問團川陝分團 三八
簡 訊	四六
編後記	四七

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上）

李銳

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到北京

毛澤東同志於一九一八年六月自第一師範畢業後，即領導新民學會的會員和湖南的進步青年向外發展，尋找革命的道路和求新的學問。毛澤東同志和蔡和森同志得悉去法國勤工儉學的辦法後，他們便組織湖南的青年和有志人士，積極參加了這一個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帝國主義曾在中國招募了十幾萬人去作戰爭勤務^{〔二〕}。這時在法國留學的吳玉章同志和蔡元培、李石曾^{〔三〕}等人，創辦了一個留法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為目的，並組織華法教育會主其事。他們回國後，便在北京、上海等地宣傳勤工儉學的主張，號召青年到法國用「半工半讀」的方法求學。

十月革命的影響當時正開始傳播到中國來，「勞工神聖」之說已為進步知識界所倡導。李大釗同志「庶民的勝利」一文就這樣大聲疾呼道：「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凡是不作工吃飯的人，都是強盜。」「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呀，快快作工呵！」當時不可能直接到蘇聯留學，東歐德、奧、捷各國無產階級又正在舉行革命，因此，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區的法國去，這種又作了工、又可求得學問的勤工儉學辦法，對一般有志青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新民學會的會員和湖南第一師範、長郡聯合中學（即現在的長沙市立第一中學）等學校的進步青年，都極願到外面求發展，家庭貧寒的青年對於勤工儉學的辦法更是歡迎。

楊昌濟先生於一九一八年到北京大學教書後，即給毛澤東同志來信，告以留法勤工儉學的辦法。毛澤東同志召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的會員商量，經過約一個月的醞釀，決定有步驟地分批前去。蔡和森同志率領第一批人到達北京，了解全部情況後，寫了封詳細的信給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又與大家再開會商量，決定由他自己率領第二批人去北京。毛澤東同志很久以來就嚮往着北京了；那兒是革命思想的搖籃，他所仰慕的革命人物活動的地方。臨行之前，他在第一師範、聯合中學等校作了號召，這次共去了二十多人。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一日，毛澤東同志為此事曾給羅學瓊同志寫了一個明信片（參見前面這樣說）：

「榮熙學長鑒：接蔡君（按：指蔡和森同志）信，知兄已發函覆我。到京赴法二百元能籌，旅保（按：指保定）一百元無着，是一問題。旅保費俟弟至京與蔡商量籌借，或有著未知。有着之時，再函知兄前來可也。文憑須即寄來，由郵雙掛號不誤。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如從事工藝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弟與蔡君等往返商議，深以同人多數他往，無有幾個從事教育之人，後路空虛，非計之得。往保固是一面，然不如從事教育之有大益處。性質長此一也；可便研究與性相近之學，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會（按：指新民學會）務之後盾三也。有此諸層，似宜斟酌於遠近去住之間，而不宜貿然從事。以後與兄商量之處尚多，此亦其一也。」

由這個明信片，不僅可以瞭解毛澤東同志如何在有計劃地組織勤工儉學運動，同時可以窺知毛澤東同志當時的深謀遠慮；他詳細研究了新民學會每一個會員的發展前途，對學會的會務在作

整個的規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同志並非籠統地認為「只要能去法國就好」；而是「似宜斟酌於遠近去住之間，而不宜貿然從事」。他並不贊成大家都到外國去，國內還是需要留人作事的；否則，「非計之得」。

一九一八年九月間，毛澤東同志帶領羅學瓊、陳紹休、熊光楚等二十人動身去北京。一路買票、管行李、住旅館，以及衛生等事，都有分工。那年黃河漲水，沖斷了鐵路，火車被阻在河南。大家都沒了主意。毛澤東同志便找本地人詳細打聽，知道黃河的水來得快，去得快，水退了就可以走。他就利用候車時間，同大家到附近農村考查農民生活情況。兩天後，水退了，但鐵路交通沒有完全恢復，要走二三十里淺水路，才能趕到前站去。有的人覺得為難，毛澤東同志就帶領大家涉過這一段淺水路。

毛澤東同志抵北京後，這時湖南青年先後已到了四五十人，那一個省也沒有來的這麼多，使得主持勤工儉學的人大為驚訝，都覺得湖南青年到底有革命精神。由於華法教育會準備工作沒有做好，還不能馬上就到法國去，因此大家不免有些怨言。毛澤東同志要大家耐心等待，反覆說明作一件事必須作好準備工作的重要。後來大家都參加了華法教育會主持的留法預備班學習。

北京不易租到房子，生活費用較高，預備班分設在三處。一處在保定，附設於育德中學；一處在北京，附設於北京大學，這兩處是高級班；初級班設在蠡縣。預備班的功課專重法文，次為製圖（這是為準備進工廠而設的）、數學等科。學習期限一年，一年後即去法國。大家對於學法文感到困難，蔡和森同志就鼓勵大家要有克服困難的精神。在蠡縣的都住在布里村，那裏還有一個鐵工廠，附帶作實習之用。

毛澤東同志和少數人留在北京，辦理各種手續，幫助經費困難的人籌款（那時有一個僑工局

可以貸款）。華法教育會要湖南來的學生提出一個赴法勤工儉學的計劃。大家推毛澤東同志執筆，寫出了一個計劃。計劃的大體內容是說明勤工儉學的意義，繼續號召湖南青年參加，以及怎樣在國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如學初步法文等），以減少到國外的困難；此外還提出如何先派一人到法國去預作佈置。華法教育會完全同意了這個計劃，特別認為先派人去作準備的意見甚好；於是決定先派一人出國。湖南來的人都推毛澤東同志去，但他謙讓了，推薦了新民學會中另外的人去。為了幫助先去的人籌旅費，安頓他的家庭以及辦行李等，毛澤東同志各方奔走，盡力最多。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全國去法國勤工儉學的青年不下二三千人，以湖南和四川兩省青年最踴躍，湖南共去了五六百人。湖南境內特別是長沙，在教育界和青年學生中，赴法勤工儉學成爲一種很熱烈的運動，並組織有華法教育會湖南分會；報紙上對此也加以鼓吹。在周南女校讀書的蔡暢同志、向警予同志等並成立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發動各校女學生參加這個運動。最引起社會震動的，便是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已經四十三歲的有名教育家徐特立，和年已五十多歲的蔡母（蔡和森、蔡暢同志的母親），也到法國去「半工半讀」，當「老學生」。爲此，長沙的報紙還發表了許多消息和評論，予以讚揚。

到法國勤工儉學的先進青年中，周恩來、王若飛等同志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前身爲工學互助社），後來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旅歐總支部。從湖南去的蔡和森、李富春、李維漢、李立三、蔡暢、向警予、張昆弟、羅學瓊等同志，都是青年團和黨旅歐總支部的積極發起者和組織者。他們和華法教育會及勤工儉學生中的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分子，進行了尖銳的鬥爭；在留法學生和華僑工人中展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他們同時領導勤工儉學生爲爭取求學和經濟權利，向把持里昂中法大學的吳稚暉和華法教育會中的國民黨官僚分子作鬥爭。一九二一年秋，蔡和森、張

昆弟、羅學瓊等同志，被法國政府以宣傳共產主義的罪名驅逐回國。

毛澤東同志不打算到法國去，他有自己單獨的學習和工作的計劃。他覺得他應留在中國。毛澤東同志在第一師範求學時，曾著意研究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這時就更明確認識到：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知識分子必須和國內的人民羣衆密切聯繫起來。關於這點，毛澤東同志自己回憶道：「我陪伴着一些湖南學生來到北京。可是，雖然我幫助了這種運動的組織，而且還有新民學會的補助，但我不願意到歐洲去。我覺得關於我自己的國家，我知道的並不够，而我可以更有利地在中國花費我的時間。那些決意要去法國的學生，從李石曾學習法文；可是我沒有，我有別的計劃。」

毛澤東同志和羅學瓊、熊光楚、陳紹休等八個新民學會的會員，當時住在北京景山東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這是一所很普通的北京三合院民房，八個人擠住在北屋靠東的一間小房中。他們的物質生活是很苦的，可是精神生活方面就大大超過在長沙的時候了。他們學習新的東西、讀書求教都非常方便，參加各種思想和學術活動的機會很多，也可以自由到北京大學聽講。他們的老師和朋友楊昌濟先生，仍時時給他們以關懷和幫助。他們的生活過得極為充實，極有意義。

羅學瓊同志寄回的家信卷中，曾談到他們這一段不平凡的生活：

「……所居之處僅八人，如毛潤之、陳贊周（即陳紹休）、熊焜甫（即熊光楚）等，皆敦品力學之人，我素所欽佩者。朝夕與處，時有受益。伙食每月三元六角，房租一元，每月約費六元之譜。此在京中爲最低廉之伙食，並不甚惡；每日食兩頓，仍爲大米飯，近亦習慣如常。至於學業，除習各科功課外，惟喜翻閱雜誌、報章及最近之新學說，其餘暫置高閣。……又京師設有學術講演會，關於文學、哲學及各種科學，可往研究，並敦請名人擔任演講，我亦時往聽講。關於名人學士之言論風采，可常接受，亦多有益。如遇課暇假

期，則與各人遊觀名勝，如中央公園、陶公亭、三貝子花園諸處，北海亦時開放，任人遊覽……」

羅學瓊同志在他的家信中，大概還不便將他們生活的情形如實寫出。毛澤東同志回憶這一段生活時，這樣說道：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窮苦的。可是另一方面，這座古代都城的美，對於我可
以算是一種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間小屋子裏住下七個人（按：羅學
瓊家信是八個人）。晚上我們七個人都緊緊地擠在一個炕上，連氣都透不過來。當我要翻身
的時候，我常常必須警告睡在我兩旁的人們。」（²⁵）

雖然一個月的生活只需要五六塊錢，但是毛澤東同志也無法籌到這筆款子，他必須尋找一個
糊口的職業。於是楊昌濟先生介紹毛澤東同志給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在圖書館當一個小
職員。到一九一九年春，湖南青年參加勤工儉學的已達一百多人，都很能吃苦，很用功，思想又
大都前進，在北京有很好的名譽。李大釗同志很看重毛澤東同志，認爲他是湖南學生的領袖，覺
得那個職位對他有些委屈，擬另外爲他介紹教書的工作。但是毛澤東同志絲毫不計較這些，他充
分利用了這個機會，滿足自己的求知慾，廣泛地吸取各種新的思想學說。

在「五四」的前夜，北京大學是革命思想和各種「新思潮」的會聚之所；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在這裏講學和作各種宣傳活動，「新青年」是他們所共同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刊物。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代表李大釗
同志和陳獨秀等，在北京大學的課堂上和課外活動中，在「新青年」期刊上，以急進的民主革命
的思想言論，鼓勵青年勇猛前進。

北京大學學生中的學術團體特別發達，如哲學會、雄辯會、體育會、數理研究會、圖書報社、新聞學研究會、「新思潮」雜誌社等，不下十六七種。毛澤東同志除經常到北大旁聽他所喜好的課程，以及和他的朋友們仍繼續保持過去在第一師範時的習慣，常到楊昌濟先生的家中（住北京後門豆腐池胡同）聽他講授有唯物論傾向的哲學和倫理學之外，還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研究會的活動。

北京大學的新聞學研究會，當時在中國尚屬創舉，每禮拜講演一次，參加的有三四十人。「京報」總編輯邵飄萍擔任講師，他是一個「充滿了熱烈理智和良好性格的人」⁽⁷⁾。邵講辦報的經驗，還有人講新聞理論。毛澤東同志多年以來就極其喜好閱讀報紙和新聞，因此他以很大的熱心和興趣參加了這個研究會，還利用晚上的時間作練習。這個研究會共辦了三個月，正式舉行過一次結業式。這對於毛澤東同志回到湖南以後，立即熟練地多方面運用了報刊武器，向軍閥反動派作鬥爭，開展革命運動，是有一定影響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還不能直接得到關於十月革命的真實報道，馬克思列寧主義也還沒有系統地被介紹進來；先進的知識分子還只能透過歐美日本資產階級的報刊的一些不正確的報道，探索到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李大釗同志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兩文，熱烈地讚揚了十月革命的勝利，表示了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革命勝利的無比信心，指出了中國革命應該遵循的方向，給予廣大青年和知識界以極大的影響。與此同時，「自由錄」、「伏虎集」等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在革命的青年學生中也頗流行，克魯泡特金⁽⁸⁾和托爾斯泰的思想還佔有一定的市場。北京大學和北京高師等校的若干學生，組織有秘密團體，流傳和研究這些書籍。因此毛澤東同志那時也讀了些有關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而且和這些學生也有過往來。但是毛澤東同志當時已是一個急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的思想的主流是更

接近「新青年」的，更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的。他自己概括他這時的思想情況是：「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加，頭腦越來越前進。」^(元)

由於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毛澤東同志來到當時全國革命的中心北京，因而有機會更開闊了眼界，吸收了許多新的思想，接近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生長於苦難的農村，在封建軍閥橫暴統治下奮力求學求出路的毛澤東同志，他忘不了生活和鬥爭了二十五年的湖南這個地方。湖南當時還是北洋軍閥張敬堯的屠場，湖南人民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湖南還是一個極為閉塞的內地；湖南有許多事情要辦，首先是需要去團結革命青年和有志的社會人士，向壓榨湖南人民的張敬堯作鬥爭。

因此，毛澤東同志於一九一九年初到上海送別第一批去法國的朋友們之後，便回到湖南來了。

「五四」運動時期的革命活動

一 「五四」前後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

一九一九年三月間，毛澤東同志從上海回到湖南。他向留在長沙的新民學會的會員們講述自己在北京的經歷，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簡要內容和社會主義的各種派別，還特別談到所知悉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情形。他要大家加強對馬克思學說的學習。毛澤東同志爲了解決自己的必需生活，在修業小學教了幾堂歷史課，月薪僅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毛澤東同志仍繼續組織湖南有志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同時進一步與社會上各方面不滿現實的人士來往，交換對時局的意見。除開各個學校的革命青年以外，他接觸了更多的教育界和新聞

界的人士，因為這時許多新民學會的會員已到教育界工作。新聞界的人對時局情況比較熟悉，他們和教育界一樣，對張敬堯的壓迫也是歷來極為不滿的。

毛澤東同志回到湖南的時候，正是「五四」的前夜。「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二〕}這時全中國的愛國人民正注視着巴黎和會中關於我國山東問題的爭執，全國人民要求取消袁世凱簽訂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要求收回被日本帝國主義在歐戰中趁火打劫奪去的山東權利。北京、上海和各地報刊輿論迅速傳播着人民的這種呼聲。

可是昏庸腐敗的北京軍閥政府與親日派大漢奸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對於巴黎和會束手無策，實際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之下；但同時，却加意防範人民的不滿，首先防範北京和全國各地學生的不滿。

湖南人心同樣甚為激昂，特別是青年學生們最為震動。他們的課堂原來就是不平靜的。（張敬堯的部隊還駐紮在許多學校裏面，教育經費經常拖欠着，教員和學生常受到「北兵」的侮辱），他們這時更不能平靜地讀書了。

毛澤東同志多年來企望着的革命風暴，眼看着就要席捲大地了。這時的中國和毛澤東同志，正如高爾基在「海燕」中描寫的：「暴風雨！暴風雨快要爆發了！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的頭上，得意洋洋地飛掠着，這勝利的預言家叫了：——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吧！」

毛澤東同志以全力注意着國內國外時局的發展，每日精心地研讀報紙，最關心巴黎和會的動

向、國內有關山東問題的輿論和人民的各種愛國活動。

新民學會的會員，這時已發展到七、八十人，增加了一些進步的中小學教師。長沙各重要學校，如第一師範、商業專門學校、第一中學、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甲種工業、甲種農業、第一女師、長郡中學、長沙師範以及明德、嶽雲、周南、湘雅、楚怡、修業等私立學校，學生會的組織大都掌握在新民學會會員或與新民學會有關的先進青年手中。毛澤東同志很熟悉這些學校中的先進分子，和他們保持着經常的聯繫，對於其中最優秀的分子來往也最頻繁。毛澤東同志將湖南革命青年的核心力量緊緊地團結在自己周圍。何叔衡同志在楚怡小學教書，毛澤東同志常召集新民學會的會員在何的住處開會。

關於形成湖南學生的統一組織問題，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有過醞釀。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中國留日學生爲反對段祺瑞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秘密訂立的共同反對蘇俄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全體罷課，被日本警察拘捕很多。在全國學生奮起響應中，湖南學生也有請願廢約的行動，進而組織學生聯合會。但組織很不健全，後來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毛澤東同志以第一師範、商業專門學校等最有基礎的幾個重要學校爲骨幹，緊張地進行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恢復和改組工作。與學校主要幹部的談話中，毛澤東同志給學生運動以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首先是力爭山東主權的完整，反對北京軍閥政府的賣國政策；對於必然會到來的張敬堯的鎮壓，也加以詳細分析。毛澤東同志號召大家起來迎接嚴重的艱巨的鬥爭。

北京專門以上學校的兩萬五千學生，於一九一九年四月底發出通電，這個通電代表了全國愛國人民的共同呼聲：「青島歸還，勢將失敗；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國民，當有覺悟，望於此日一致舉行國恥紀念會，協力對外，以保危局。」〔二〕

這個通電給予湖南青年學生和愛國人民很大的影響。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首先發動的中國人民的偉大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爆發了。毛澤東同志說過：「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二)毛澤東同志和李大釗同志就是當時左翼知識分子的最傑出的代表。因此，「五四」運動一開始，就「帶着爲辛亥革命還不會有的歷史姿態。這就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三)。

北京五千學生和市民羣衆在五月四日的遊行示威中，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誓死爭回青島」，「抵制日貨」等口號；並且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痛毆章宗祥。第二天全北京學生總罷課了。

革命的風暴立即席捲全國。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和華南、西北、東北各省的學生，紛紛起來響應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

段祺瑞的走狗張敬堯知道形勢嚴重，在湖南進行了橫暴的嚴密的控制：警察廳每天派員檢查報紙，嚴禁刊登有關愛國運動和不滿段政府的消息，而且不許報紙開天窗；同時嚴格禁止學生作愛國活動。然而張敬堯這種高壓政策，不可能阻止青年學生和人民羣衆愛國熱情的奮發。

毛澤東同志自己寫了號召大家行動起來的傳單，以幾個學校學生會的名義散發出去。新民學會的人日夜緊張地活動，動員各校學生準備罷課，推選代表正式成立學生聯合會。在毛澤東同志的推動和領導下，湖南學生聯合會終於在六月三日正式宣告成立。成立之日，爲爭回青島發佈了罷課宣言；宣言最後一句是：「請斬曹、陸，以謝天下。」^(四)就在這一天，長沙全體學生總罷課